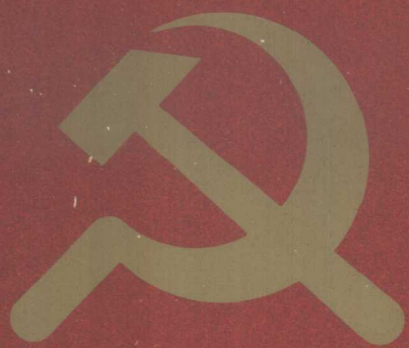




中共党史人物传

陈序

精选本
8

编委会主任 李力安

主编 陈志凌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

第八卷·政治经济建设篇(下)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编

编委会主任:李力安

主 编:陈志凌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顾 问

习仲勋	肖 克	杨成武	马文瑞	邓力群
段君毅	赵南起	李葆华	穆 青	吴 仪
邵华泽	刘纪原	徐光春		

编委会副主任

李铁林	刘云山	徐文伯	陈 虹	桂晓风
热 地	舒惠国	林开钦	何光暉	朱新民
朱佳木	王重农	尚 文	赵培义	李 岩
魏久明	王 洪			

副主编

郑建英	杨瑞广	姜华宣	吴殿尧
-----	-----	-----	-----

编 委

马洪武	王 良	王性初	王永仁	邓 斌
冯树成	吕芳文	阎景堂	朱成贵	朱敏彦
李宏塔	杨世兰	吴家林	陈弘君	高三山
郭洛夫	周垂远	黄 玲	黄 瑶	蒋建农
程韶韵	翟作君	戴知贤	刘勉玉	张广立
郑洪泉	雷 厉	张国良	温厚文	贺 扬
管景臣	宋毅军	赵俊清	宋 霖	陈瑞云
蒋伯英	王江松			

目 录

政治经济建设篇(下)

林 枫	(1)
姚依林	(44)
段君毅	(127)
贾拓夫	(188)
徐 冰	(217)
钱 瑛	(273)
钱之光	(295)
康世恩	(344)
陶 铸	(421)
姬鹏飞	(471)
黄 敬	(535)
黄火青	(574)
彭 涛	(609)
蒋光鼐	(635)
蒋南翔	(680)

程子华	(714)
傅作义	(765)
曾 山	(810)
谢觉哉	(852)
廖承志	(896)
廖鲁言	(945)
滕代远	(989)
谭震林	(1048)

林 枫

穆 欣

编撰者话 林枫,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担任党的领导工作,马列主义思想水平高,对党的方针政策理解深,在中共晋绥分局,东北局任职期间,对扩军支前和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

林枫原名郑永孝,又名郑伯桥(伯樵、伯乔)、郑凌风、林硕石。1906年9月30(农历八月十三)日生于黑龙江省望奎县郑长江屯(郑家围子)一个人口众多颇为殷实的农家。

林枫的祖籍在山东省海阳县,世代务农。清朝末年的一个夏天,林枫的曾祖父挑着自产的樱桃去赶庙会,突然有几个地痞窜上来,把樱桃全部抢走。曾祖父饱受官府和兵匪的剥削欺压,早憋着一肚子闷气、怒火,如今又遭这班地痞欺侮,忍无可忍,抡起扁担把劫掠者打倒在地。他见出了人命,乘乱逃离现场,并在当天深夜,携儿带妻,离乡背井,举家“闯关东”,逃到南满。以后又辗转流徙,历尽艰辛,才来到北大荒,最后落脚在绥化县恭字头井(当时望奎尚未设县,此处还归绥化县管辖,到1917年才设望奎县治)。适逢此时官厅招民垦荒。林枫的曾祖父带领全家老小,就地取材,在荒地上盖了个马架子,又揽了一片荒地,成为这个地方的开荒占草户,郑长江屯也因此得名。一家人长年在荒原上

劳动,艰苦度日,白手起家,开垦了二百多垧土地,逐渐创建起一份家业。当时匪盗蜂起,社会动乱。为了防备匪盗的骚扰,全家动手,在宅院四周筑起一圈五六尺高的围墙,这个屯子从此就被称作“郑家围子”。

郑家围子远距县城三十余公里,附近七沟八梁,起伏不平,屯落稀疏,人烟稀少。村南不远是深达几十丈的崖子,崖上绿草成茵,树木繁茂;背后则是一望无限的荒原;崖下自东而西流着清澈的呼兰河,展现一片辽阔的河沙漫滩。林枫就在这里度过了苦涩的童年。当然,这种环境也有助于养成一个人的刚强意志,开阔胸襟。林枫喜欢大自然的山川草原风貌胜于盆景渊源于此,他喜欢真实朴素的美胜于修饰装扮也与此有关。

从7岁起,林枫进私塾读书。启蒙老师是他的四叔。四叔名郑元臣,字品三,是一个为人正直、颇有旧学根底的士子。他痛恨贪官污吏,不愿参与政界混事,决心从事教育,愿把所学的知识传授给下一代。他在众侄儿中,发现林枫待人忠厚,聪慧爱学,便加意培育。林枫11岁就读完了《四书》、《五经》的主要篇章,而且能够熟练地出口成诵,善写会讲,深受师长和同窗学友的赞赏夸奖。品三先生的严肃和善,诲人不倦,也给林枫以良好的影响。

1918年,郑家这个拥有108口人的大家庭,为了缩小目标,以图减轻官府的苛征暴敛,分成七股,各立门户。林枫的父亲郑元良决心弃农经商,便带着他的妻儿迁居望奎县城,买了几间房子,与人合股开设了“金大钱号”,维持一家生计。就在这年,12岁的林枫考入了望奎县第一高等小学校(简称“南高等”)高级班。高级班二年毕业,开设六门课程:国文、算术、地理、历史、音乐、体育。他学习的兴致很高,刻苦钻研这些新学的课程,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他在校中专长文史,喜读《左传》、《史记》,深受书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观点的感染,逐渐萌发了朴素的爱国思想。

1920年,林枫从“南高等”毕业的时候,父亲经营的钱庄岌岌可危,手头拮据,打断了他升学的希望。第二年,金大钱号就被“大鱼”吃掉。林枫是这个家庭中的长子,父亲托人在县邮局给他找了个差事,盼望他能赚几个钱补贴家用。这“差事”名义上是学习电报生,实际是让他整

天给邮政局局长扫地、倒水、沏茶、点烟……根本同邮政局的业务不沾边。他强烈的求知欲望无法实现,又得担负这份不顺心意的“差事”,动辄还会受到局长的斥骂,内心十分痛苦。干了一段时间,他再也不愿继续给邮政局长当奴仆,为此常同父亲争执。他想继续求学的要求,没有得到父亲的应允。他很气愤地说:“宁可到市上摆个书摊,卖报纸笔墨,也不当这个差事!”不久,他便毅然辞退了这份差事,设法寻找到一些书籍,蹲在家里苦读。

这个时候,他父亲在商界的一些朋友常来家里作客。这些走南闯北的客人,在同父亲闲谈中,时常带来关内各大城市的各种消息,其中许多是林枫爱听的新鲜事儿。使他最感兴趣的,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北京爆发的五四风暴,以及由此蔓延全国的学生爱国运动。这些消息使他兴奋,使他深思,在他心头点燃起希望的火焰。他下定决心要离开闭塞的家乡,前往关内继续读书。

1923年春天,父亲终于同意了林枫的请求,筹措了学费,让他同一位商人到了天津。他决心要进南开中学,但他的数学基础较差,英语从来没有学过,只有国文根底较厚,便先进南开中学新生考前补习班补习了一年。第二年夏天,终以较好的成绩考入南开中学。他在这时由郑永孝改名郑伯桥。

进南开中学后,林枫学习更加勤奋,课余时间大部分在图书馆里度过,星期日常常也不休息,如饥似渴地阅读课外书报。他读书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李大钊、鲁迅和郭沫若等人的著作,是林枫经常的读物;《小说月报》、《语丝》、《剧选月刊》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文学丛书》等,也是他经常阅读的书刊;还经常阅读《向导》、《新青年》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著作;也读过一些鼓吹无政府主义的书刊。通过读书,林枫打开了眼界,使他更加注意时局的发展,关心国家的前途,寻求民族的出路。他与同寝室的同学鲍永瑞、张文佑以及同乡同学綦书功等,自发地结成了学习小组,相互切磋琢磨,各抒己见,有时还进行热烈的争论,毫无拘束地抨击时政,大胆提出各种主张。经过学习和讨论,林枫逐渐了解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救国救民的真理,决心献身共产主义事业。

林枫的文章写得出色,又善于演说,深受大家称赞,在同学中颇有威望。初中二年级时,他就被选为校刊编辑,后又当选为校学生会会长。他待人谦虚诚恳,热心为大家服务,组织同学开展了许多有益的活动,引导一些同学趋向进步。他的活动得到学校中共党组织的关注和支持,在政治思想上也常得到共产党员的帮助教育,使他的思想觉悟逐渐提高。

1924年冬天,孙中山为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结束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决定北上,于12月4日抵达天津。林枫积极组织、带领南开中学进步同学参加各界举行的欢迎会,会后又以学生会会长的身分,在南开中学组织宣传活动,讲解召开国民会议的重要意义,介绍孙中山《北上宣言》的内容。校方畏惧学生运动的发展,曾以“救国不忘读书”规劝学生,想抑制他们关心国事的热情。当时曾是南开中学校董之一的丁文江,应校方的邀请来校讲演,宣扬“读书救国”论,引起进步师生的反对。事后,学生会散发了反驳丁文江的传单;林枫还代表同学出面与校方辩论,据理驳斥了丁文江鼓吹的错误言论。鼓舞了进步同学的斗志。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赵世炎等到天津发动工人和学生声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林枫在中共组织领导下,向同学们报告五卅惨案的经过,控诉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的罪行。他还通过学生会组织许多同学参加演讲、募捐和示威游行活动,并带头冲破军警的阻拦,向日本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此后,林枫接受中共组织的指派,在南开中学创办平民夜校,既做校长,又兼教员。他不辞辛苦,无论严寒酷暑或狂风骤雨,都准时前往上课。他还常到工人和贫民住处进行访问,了解他们的困苦,鼓励他们起来斗争。

1926年9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后,南开中学教师、共产党员何雪,秘密发动同学参加国民革命军,积极筹备组织欢迎北伐军的各种活动。林枫早想投笔从戎,这时便毅然辞掉学生会会长职务,和几位进步同学秘密考取了黄埔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其后,他又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放弃了这个学习机会,继续留在天津工作。

林枫周围团结了许多进步青年,经常密切来往的有十多名。他们

以主持正义、追求真理相互勉励,其中的绝大多数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27年3月,林枫由中共南开中学支部书记范文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自己多年的夙愿。林枫入党后,担任中共南开中学支部和中共天津市委的联系人。

二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天津市委决定将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党员隐蔽起来。林枫于5月初暂回望奎。他向亲友邻里讲述政治形势,宣传革命道理;还把自己收藏的进步书刊,送给少年时的同学传阅。他在家乡停留了二十多天,回到天津的时候,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林枫十分着急,来往奔波平、津、沪、汉、江、浙等地,仍未接上组织关系。后经师友介绍,暂到江苏省东海县海州中学任庶务,同时在青年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1928年5月3日发生济南惨案后,他冒着风险,带领一些教师、学生深入农村宣传抗日。这年9月,他从海州中学回到天津,继续寻找党组织。1929年春,他转到北平,住在福兴公寓复习功课,准备升学。夏天,他改名郑凌风,考进北平大学工学院读书。1930年,林枫终于接上党的组织关系,担任了中共北平大学工学院支部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不抵抗”,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迅速侵占东三省,全国痛愤。林枫生在东北,长在东北,对于九一八的惨变格外伤痛。直到十几年后,他为东北抗日暨爱国自卫战争烈士题词的时候,还以极度悲愤的心情写道:“烈士之血为反帝反封建而流,烈士之名以反帝反封建而寿。众志成城,世界应为人民所有,使‘九一八’之惨祸不再见于今后。其死也光荣,其精神不朽。白山雄峙,黑水浩流,丰功伟烈,永垂宇宙。”

11月底,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在北平发动反日斗争,组织“南下示威运动”。12月1日,北平大学等二十余所学校学生一千六百多人,组成北平各大学南下请愿团离开北平,3日到达南京。5日,请愿团

在南京游行示威,行至成贤街时遭到警宪镇压,当场1人被打死、33人受重伤、185人被捕。这批学生离平后,北平各校爱国学生,继续组成了人数更多的“北平各校学生南下示威团”。林枫以北平工学院代表的公开身分参与领导了这场斗争。他是南下示威团的党团负责人之一,受党的委托,和其他四位党团成员共同指挥这场斗争。

12月4日,北平大学法学院、女子文理学院、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北平大专院校和一些中等学校参加南下示威团的学生二千多人,先后汇合到北平东车站,准备乘车南下。但当示威团的总指挥部找车站站长商洽车辆时,遭到拒绝,说是奉令不能开车。学生交涉无效,强行登上所有进站的火车,继由各校学生代表开会决定进行卧轨斗争。各条铁轨上都躺满了人,车站所有要害场所亦尽被学生占领。卧轨斗争坚持了三昼夜,北平当局终于在7日凌晨下令开车送北平学生南下。8日车经济南车站,得到济南学生支援,冲破了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阻拦;山东当局亦被迫同意济南学生参加南下示威。

北平各校南下示威团于12月10日到达南京,济南二千多学生也在当天傍晚到达。这时得知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示威学生也将到达,遂决定等各地学生到齐后联合举行示威活动,已到南京的各校学生先在街头宣传抗日。13日,沪、杭、穗等地学生陆续到京。14日举行了全国各校第一次联合大示威,目标是国民政府,并在各主要街道游行示威;还决定由北平各学校代表中产生总指挥(后选定北平法学院代表)。示威学生来到国民政府,只见大门紧闭,卫兵林立,院里还架着机关枪。学生要面见蒋介石,蒋只派一个秘书长出来敷衍。学生愤然离去,在各主要街道进行示威讲演。16日上午,各地学生又来到外交部门前,高呼“砸烂外交部”、“撕毁卖国条约”口号,并往院里冲。外交部人员逃避一空。学生队伍转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党部也是铁门紧闭,戒备森严。学生气愤地缴掉卫兵的枪械,砸毁大门上的国民党党徽,高呼抗日救国、反对内战口号。正在里面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临时会议亦被迫停下,蒋介石让考试院院长蔡元培、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出来应付,遭到学生的围困质问。军警悍然开枪镇压,学生一面与警察搏斗,一面抓住蔡、陈二人作“人质”,直到警察、特务住手,学生才撤出现场。

此前一天,即12月15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曾公开造谣诬蔑示威学生,为当局镇压学生制造借口,并对学生恫吓威胁。因此,16日那天,爱国学生代表还前往中央日报社质问并驳斥其造谣诬蔑,该报不肯正面回答又拒绝在报纸上更正。于是,17日上午,各地和南京各大中学生一万余人,在南京举行总示威,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党部紧闭大门,学生愤而将悬于大门口的党徽砸毁。下午,示威学生一千多人冲到中央日报社,将报馆捣毁。这时,南京军警倾巢而出,在中央日报社所在地珍珠桥屠杀学生,有三十多人遭惨杀、数百名受伤、大批被捕,造成一场规模空前的血案。

各地示威团连夜联合开会,决定第二天继续举行总示威,绝不在反动暴力面前屈服。当夜,所有各地来的示威团学生住处均被军警包围,18日一早,军警闯进学生宿舍,捆绑所有学生押上火车返校。北平示威团的学生也被绑架推上火车,押回北平。

这次北平南下示威团总指挥、北平大学法学院学生李时雨,过去曾得林枫的帮助,思想上不断进步,在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次南下又不断得到林枫的鼓励帮助。李时雨在南京被推为总示威游行的总指挥时,感到担子重,林枫鼓励他:“这种危险的担子,咱们不担谁来担?这是共青团员受考验时候啦!”他还以切身经验告诉李时雨注意事项和应做的准备工作。游行队伍到国民政府门前,蒋介石避不见面,学生非常气愤。林枫和党团成员研究,认为斗争应当适可而止,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遂引导学生队伍转往中央党部去示威。总示威中砸了外交部、中央党部后,李时雨说:“我还是第一次经这样大风雨,见这样大的世面!”林枫鼓励他:“指挥这样激烈的战斗,正是锻炼的好机会。革命的大智大勇就是在这种场合锻炼增长起来的。”李时雨在这次南下示威行动中得到锻炼,同年12月下旬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南下示威团回北平不久就遇上过春节。北平和关内各省学生相继返家团聚,唯独东北籍学生无家可归。除夕那天,林枫将在北平的东北籍学生三百多人,邀到北平工学院过节。大家谈起国破家亡的痛苦,异常难过。当场有人讲,原黑龙江省省长万福麟,平日鱼肉乡民,国难当头却躲在北平过着花天酒地的腐化生活;他的儿子万国斌,席卷黑龙江

省官方银行所有库存,连同他们父子历年搜刮的民脂民膏一齐带来平津挥霍。同学们听后无不义愤填膺,当即决定去找万福麟算帐。他们在林枫领导下来到煤渣胡同万的公馆门前,要求他吐出贪污的赃款,救济流亡关内、饥寒交迫的黑龙江省同胞。万福麟十分惶恐,慌忙勾结北平当局派兵镇压。林枫领导同学们进行斗争,事后又积极营救这次被捕人士,直到被捕人员全部获得释放。

1932年,中共河北省委为了加强对群众性反日斗争的领导,任命林枫为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反帝大同盟的领导机关设在北平,除了经常进行北平反帝运动的组织工作外,还出版了《反对帝国主义强占东北宣言》、《告日本驻华士兵书》、《告工人书》、《反帝新闻简报》、《工农周报》、《红军歌谣》等书刊。这年6月1日,由林枫主持,在北平举行了河北省反帝大同盟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五十多人,代表着河北省各主要城镇的七百多名盟员;北平各革命社团以及抗日反帝的团体也派代表出席。会议交流各地斗争经验,研究斗争纲领、策略,建立了统一领导机关。7月,林枫代表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反帝大同盟全国代表会议筹备会议,参与讨论了反帝反蒋斗争大计。

1932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建立北平市委,林枫担任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不久,改任北平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33年春,在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取消市委后,又调林枫担任河北省委巡视员。这年3月,日军逼近长城各口,直接威胁平津,有的部队奋起抗战。3月9日,蒋介石下令中央军监视长城各口部队,严禁将士请求抗战:“侈言抗日者杀勿赦!”激起华北人民的愤慨。中共河北省和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发出《告劳动群众书》,号召劳动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扩大民族战争,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境,推翻反革命的国民党统治,实行保卫热河,保卫平津以及华北。”这一号召得到北平人民热烈拥护,大家积极支援长城抗战,捐献大批物资送往前线,许多青年还直接参加了作战。

4月,由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出面,联合北平各大学师生代表等与李达钊生前友好,发起举行了李大钊公葬仪式。林枫参与组织领导了

这场声势浩大的斗争。4月23日清晨,由学生、工人、士兵组成的送葬队伍从浙寺出发。得到消息的市民,佩带着白花、黑纱,有的手执花圈、挽联,不断地从大街两旁的小胡同里涌出,汇入送葬的洪流。每到繁华地方,还有群众团体拦灵公祭。到西单时,送葬的人群堵塞马路,汽车、电车都不能行驶。一路上,“大钊先烈精神不死”的口号响彻云霄,《国际歌》的歌声悲壮激昂。这是人民群众对先烈发自内心的悼念,也是一次对反动派的示威,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

群众革命斗争的高涨,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惧和仇恨。从1933年5、6月开始,成批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有四五百人惨遭杀害,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党员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林枫这时的处境异常艰难,随时都有被捕遇害的危险。但他态度沉着,不避艰险,排除种种困难,坚持工作,指挥幸存的党员隐蔽下来。这年冬天,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搜捕,林枫曾到江苏沛县郝寨他最好的朋友鲍永瑞家里暂住。转过年来,他又利用朋友——华北教育劳动者联盟张柏园的关系,到山西省城太原成成中学任教。

1934年4月,林枫回到北平,改名林硕石,假扮张文佑的表弟,以养病为名,暂在西山碧云寺附近找了一间民房隐蔽。林枫没有经济来源,生活费用全靠同学、朋友接济。1935年5月,因遭敌人破坏,中共顺直省委(即河北省委)陷于解体。为找组织关系,林枫先到济南,又到江苏沛县郝寨。之后,林枫又经张柏园、张苏介绍,转到河北省宣化市第二中学教书。

1935年12月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林枫听到这一消息,马上从宣化赶回北平,与党组织接上关系。中共河北省委决定重建北平市委,派林枫继续担任市委书记。

林枫到职以后,集中主要精力领导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林枫等看到12月14日报载“冀察政务委员会”定于12月16日成立,于是决定在16日举行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林枫与学联核心成员彭涛、黄敬、姚依林等仔细研究,作了严密的布置。16日上午11时许,参加游行的各路队伍,经过与军警的激烈搏斗,冲破层层封锁,到达预定的集合地点天桥,召开了有两万多名学生、市民

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与会群众由南向北,沿正阳门大街举行示威游行。北平当局如临大敌,派出警察、大刀队、侦缉队砍杀学生。游行队伍勇敢地冲击拚搏,有许多学生受伤。这次示威震撼了北平全城。

为了阻止全市各校继续罢课,反动当局宣布提前放寒假,限学生在12月23日前一律离校,并利用提前放寒假的机会,引诱学生到南京“聆训”,向蒋介石“献剑致敬”。12月下旬,北京学联核心成员开会讨论此事。会议根据林枫与彭涛等事先商定的意见,决定不参加南京“聆训”,而由学联发出号召,成立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河北农村“唤起民众”,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1936年元旦刚过,北平、天津学生共组成四个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北平三个团,天津一个团),陆续冒寒南下。1月9日,四个团在固安城郊汇合举行会议后,即分赴各地,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团在各地农村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却遭到反动势力的忌恨、阻挠、破坏和镇压。二十多天后,有的团被武装解散,有的被押送回北平。他们在与农民接触中,看到劳动人民的痛苦,地主阶级和反动势力的残暴,开始认识反封建、反帝任务的紧迫和重要,以及革命力量组织起来的必要性。第三团在高碑店被解散前,决定要成立持久性的抗日团体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第一、二团在保定汇合后也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宣传团陆续回到北平后,林枫与姚依林、黄敬等于1月底在清华大学同学会举行会议,商定: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宣传团同志们的意愿,决定将南下宣传活动中涌现的大批积极分子进一步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抗日的、先进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组织。2月1日,在北师大召开了“北平民先”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北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正式成立。“民先”很快发展成为全国革命青年的组织,实际上成了共产党领导全国爱国青年抗日的纽带。

南下宣传团回到北平时,各大中学校将要开学。林枫从革命的长远利益着眼,适时地提出学生不应当无限期的罢课,而应有条件地复课,学生运动的骨干也要回校学习,参加考试。1月底,根据中共北平市委的决定,成立了扩大的北平学联党组织,加强党对学生运动的领

导。党团书记是姚依林。不久,学联发表了复课宣言,结束了无限期罢课的局面,反映了同学的意愿,获得了社会的同情。

就在这个时候,反动当局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与迫害。2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令》,接着就宣布解散北平学联,大批学生被逮捕。根据形势的变化,林枫向中共河北省委提出建议:把在一二九运动中已经引起反动当局注意的同志转移到天津等地工作,以免遭受迫害。河北省委接受了这一建议,为保存干部和充实天津市及华北五省的抗日工作力量,从北平抽调了一批干部到天津等地工作。

林枫在一二九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以及诚恳谦虚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深得党内外同志的尊敬,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在林枫直接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的姚依林,几十年后回忆说:

从1935年12月中旬起,到1936年3月中下旬,我在林枫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我们的联系是密切的,每星期至少见一次面,有时见两次面。我把工作中了解的情况和遇见的问题详细地向他汇报,每一次他都充分地听取我的反映,征求我的意见,然后将他的意见提出来同我讨论,取得一致。在这几个月的接触中,我对林枫同志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林枫同志在政治态度上,对“一二·九”运动是积极支持的。当时,在市委内,对“一二·九”运动的问题,是有些不同意见的。多数同志对“一二·九”运动积极支持;有少数同志对“一二·九”运动中的一部分口号和做法,从“左”的观点出发,有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有些同志则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林枫同志作为北平市委书记,对“一二·九”运动积极支持,对运动的继续深入和向全国范围扩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林枫同志对“一二·九”运动中重大问题处

理,是实事求是的。在林枫同志担任北平市委书记工作的期间,“一二·九”运动遇到过许多重大问题。其中有:国民党政府针对学生罢课而宣布放寒假;国民党发起北平学生赴南京向蒋介石献剑致敬活动;平津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成立与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平津学联会;平津学生的南下宣传运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立;1936年2月宣布复课后,国民党对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包围,逮捕进步同学,等等。在这些事件中,每一件都包括着革命力量和反动势力针锋相对的斗争,任何一着棋走得不好,都可能招致全局的损失。当时,北平的学生运动,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发动了群众,灵活地运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打击孤立了敌人,壮大了自己,继续前进。我认为,这同林枫同志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林枫同志是一个沉着、冷静,说话不多,很少“放言高论”,虚心研究与解决实际问题的人,他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三,林枫同志的作风是民主的,对青年干部是爱护的。当时他是市委书记,我是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他是已经有十来年革命历史的老干部,我是才入党不久的青年。但是他认真听取意见,平心静气地讨论,耐心地说服教育,从来不勉强别人接受他的意见,他的这种民主作风赢得了我对他由衷的信任和尊敬。特别是在1936年初,我因反动当局的追捕而隐蔽起来暂停工作以后,他几乎每个星期都到我隐蔽的地方来看我,同我谈形势、谈工作、谈思想,每次几乎都要谈一两个小时,直到他调离北平。这不仅使我受到了深刻的党的教育,而且使我与林枫同志之间建立了很深的同志的情谊^①。

^① 姚依林:《忆林枫·序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